

数字技术赋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 挑战与应对

刘子平，满星冉

(聊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聊城 252059)

摘 要：以数字化和智能化为本质特征的数字时代的加速到来，推动了数字技术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嵌入与整合。主流话语在数字技术赋能下具有传播方式灵活化、呈现方式立体化、内容投送精准化的特点，这为中国共产党话语权建构提高了话语输送时效、丰富了话语具象表达、满足了受众不同需求。与此同时，话语主体多元化、表达方式碎片化、话语传播圈层化、资本介入“泛娱乐化”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带来挑战。因此，必须从优化主流意识形态内容供给、增强主流意识形态主体能力、提高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效能、加强主流意识形态风险防控多维路径协同推进，确保数字技术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正向赋能。

关键词：数字技术；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挑战；应对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217 (2024) 04-0011-08

收稿日期：2024-05-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21ADJ005)；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形象研究。

作者简介：刘子平 (1979-)，男，山东临沂人，聊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满星冉 (1999-)，女，山东聊城人，聊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DOI:10.16284/j.cnki.cn37-1401/c.2024.04.010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意识形态工作摆在全局发展的突出位置，他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① 意识形态作为一种价值观念，要发挥思想引导、舆论导向、价值定位等作用，就必须借助相应的话语体系。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用党的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牢牢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注意提高意识形态话语质量，确保说得出、传得开、听得懂、真信服。数字时代是以“互联网+”为背景形成的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时代，其本质是数字化和智能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算法、元宇宙、区块链等技术的更迭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数字技术在给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提供新契机的同时，也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在数字时代运用数字技术，抓住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高效赋能，成为当前我们亟需回答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一、数字技术赋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新契机

数字技术打破了时空限制，将人类带入数字时代，为人类提供了一个自由、平等、开放、包容的网络生态系统。对于意识形态而言，数字技术呈现的传播方式灵活化、呈现方式立体化、内容投送精准化，能够大大提高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输送时效、丰富话语具象表达、满足受众不同需求。

(一) 传播方式灵活化，提高话语输送时效

传统媒体的话语主体比较单一，一般是国家或者权威机构，信息的发布通常是权威主体根据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需要以报纸、电视、广播等方式“自上而下”单向度发布信息。传统权威机构在信息发布的时间上较为固定，通常是栏目播出时间或报纸售卖时间，这一时间也成为受众获取主流意识形态内容的最前沿。在网络空间中，数字化是事物存在的基本样态，文字、图像、音频、视频等都以数字化呈现，非线性化

^①《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年，第 33 页。

的数字空间为人们“获取信息、通讯联络和娱乐提供了异乎寻常的力量”^①。首先，利用数字技术可以实现多种渠道获取信息。人们可以通过搜索引擎、社交媒体、微博等不同的渠道了解到最新的信息观点，可以更快地进行反应和回应。数字技术带来的多样性传播使得意识形态传播更加丰富生动，话语输送时效性大大提高。其次，国际话语传播方式发生改变。在数字技术构筑的互联网中，国与国之间的传输壁垒被打破，各种链接、网址、APP等数字中介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联通更趋密切，多种话语自由流动，官方话语和网络用语交流、交融、交锋。这种全球性的传播方式促进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传播，促进了文化间的对话和碰撞，大大提升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时代感和传播力，将更加真实、立体、全面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借助数字技术传递给世界人民。

（二）呈现方式立体化，丰富话语具象表达

数字时代，虚拟技术可以通过增强现实（AR）和虚拟现实（VR）等手段，将主流意识形态的呈现方式从传统的平面文字、图片和视频转变为立体化的体验。通过AR技术，用户可以通过移动设备扫描一张新闻图片，从而在图片周围看到与之相关的文字解释、背景视频或数据图表分析等内容，为图片内容提供更深入的信息和上下文关联；还可以运用AR技术浏览历史图片、发展时间线等资料，丰富受众新闻体验的空间感和历史感。VR技术则把观众带入到三维、全景的现场环境中，允许观众在虚拟的现场中自由探索、体验，与环境进行交互。VR技术实现了虚拟空间与现实世界的真正连接，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表达提供了新的时空场域和实践范式，提升了受众对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体验感和认同度。例如2022年全国两会生成的政府工作报告《XR看报告：绘景未来》，从儿童视角出发，运用XR扩展现实拍摄、VR绘画和虚幻引擎三维渲染二维等技术，构建了童话一般的虚拟场景，第一次实现了实景布景与虚拟场景融合，用“绘景”展现“愿景”，呈现出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的重点目标和任务。新华媒体这一创意，将严肃艰深、理论抽象的信息内容转化成人民大众愿意看、喜欢听的生活场景，拉近了政府与人民之间的距离，增强了政府的威望和信服力。

（三）内容投送精准化，满足受众不同需求

依托数字技术产生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可以对用户群体进行精准分析和目标投送，从而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提供强大驱动力。首先，精准分析受众群体。“做宣传工作的人，对于自己的宣传对象没有调查，没有研究，没有分析，乱讲一顿，是万万不行的。”^②精准分析用户群体是传播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重要前提。后台算法以用户在不同数字图像的停留时间、点赞、收藏、评论等数据痕迹为依据进行分析，依次降低热度从而找到受众最精准的喜好。一旦当下受众兴趣点发生改变，数字技术则会依据协同过滤、评估算法等方式重新收集数据，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提供精准受众跟踪。其次，依据需求进行内容定制投送。如果说精准分析受众喜好是算法推荐技术的起点，那么根据所得数据进行话语内容定制并定向投送就构成这一规则的最终目标。算法作为人工智能的核心，能够通过多种信息推送机制和嵌入机制投送给受众触及内心深处的思想观念，在赢得受众关注的同时增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感召力。如新华社第一位机器人记者“快笔小新”能够根据实时报道迅速采集整理数据，完成稿件写作。同时它还可以通过采集有声誉的专家微博为编辑记者提供素材参考，提升新闻信息的生成能力和发稿时效性，实现对主流意识形态内容的精准定制。

二、数字技术赋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风险挑战

世界著名媒体文化研究者尼尔·波斯曼指出：“每一种技术都既是包袱又是恩赐，不是非此即彼的结

①[美]丹尼尔·伯斯坦、戴维·克莱恩：《征服世界数字化时代的现实与未来》，吕传俊、沈明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年，第133-134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37页。

果,而是利弊同在的产物。”^①数字技术作为一种全新的信息传播手段,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提供新机遇,与此同时它所具有的话语主体多元化、表达方式碎片化、话语传播圈层化、资本介入“泛娱乐化”这些风险也在冲击着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地位,为主流话语体系建构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 话语主体多元化,削弱主流话语权威

传统媒体时代,党和政府具有对主流话语的绝对主导,任何信息的编辑、审核、发布都由此一元主体所决定,受众处于“被动接受”状态。伴随着数字化转型和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话语体系传播发生了变化:过去一元传播主体的垄断格局被打破,各组织机构、社会团体以及个人都迅速崛起成为信息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官方话语、群体话语、个体话语交织汇合。数字转型时代,“人人都是麦克风”现象逐渐走向大众化,网络群体由90后、00后向外扩展。受众凭借生活经验、知识储备和自身所具有的世界观以多种形式如短视频、公众号文章、直播等在互联网上进行“发声”,同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契合程度具有极强的不确定性,再加上资本不断介入,数字技术中的算法工具属性与价值属性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这就导致部分自媒体账号为了追求更多利益紧跟网络热点跟拍、仿拍,导致层出不穷的流行语、热词、隐语出现,重塑着受众的交流习惯和话语表达。《咬文嚼字》主编黄安靖指出,2023年评选的十大流行语,有40%到50%始发于短视频。这些高人气的短视频凭借自身浏览量和点击率吸引更多受众学习、效仿,更助推了话语主体从“一元”向“多元”的转变。多元话语分散了受众对主流话语的关注度,抢占主流话语的生存空间,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面临更大挑战。

网络已成为大众日常生活、工作交往的重要媒介。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发布的最新数据,截止2023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79亿人,手机网民规模达10.76亿人,短视频用户规模为10.26亿人,占网民整体的95.2%。^②当某一事件突然发生时,自媒体用户可以第一时间通过网络发布观点、设置议题、完成议程,在整个传播过程中实现对事件的价值引导,从而大大缩短了舆情发酵时间。由于自媒体用户生活经历和对事物的认知程度的不同,众多事件议题并不具有公共理性话语的普遍性和受约束性,取而代之的是具有差异性、具体化的生活话语。虽然各具特色的生活话语构成对社会事件的多元化表述,但也更容易引发更具争议性和冲突性的话语碰撞,削弱主流话语权威。

(二) 表达方式碎片化,消解主流话语认同

主流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权威话语和深刻内涵需要经过长期系统的学习、深入的思考才能达到入脑入心的效果。原始社会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人类对时间的感知相对模糊;工业时代钟表的出现,时间开始从空间中解放出来并以独立的形式存在于人类生产生活中,人们对时间的把控逐渐精准;数字化时代技术的发展拓展了时间的时代内涵,人们不再是时间的被动支配者,一时多用、流动性、碎微化成为现今时间的主要特征。基于这一转变,媒体话语表达开始呈现碎片化的表达趋势,众多信息传播平台试图以更精简的时间、更精妙绝伦的画面抓住受众眼球,海量的信息生产和交互式的信息传播不断提升着人们的浏览速度,浅表化的画面抢占着人们的深度思考。在多重因素影响下,人们更加注重自身的感受,逐渐丧失对复杂叙事的关注和兴趣,丧失自主思维和系统思维能力。

当前,在数字技术驱动下话语内容呈现出主动碎片,减少了主流话语的出现频次,不断影响人的主体感知。碎片化表达一方面容易使受众片面解读主流媒体发布的官方文件和政治话语,片面理解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从而增大主流话语内容与个别受众所理解的话语内容间的歧义,消解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威;另一方面也会不断侵蚀人的主体意识和认知能力,使其更趋于表层的感官认知和思维的简单化,片面追求自身感官体验,从而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内容规范性产生质疑、抵触情绪,消解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认同。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伴随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世界人民对中国认知更加全面立体,西方媒体简单粗暴的意识形态谩骂已经不能蛊惑人心,利用话语霸权编制的话语谎言出现不少裂痕,部分西方媒体开始进

^①[美]尼尔·波斯曼:《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何道宽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2页。

^②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5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23年,第1页。

行精心伪装,以片面夸大事件严重性、模糊相关数据等碎片化的形式解读党和政府的主流话语。比如以河南洪灾事件为例,人民网英文版和 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都进行了应急报道,但经过比较可以发现 CNN 在报道题目上趋向于采用多修饰性词语,夸大事件的严重性和洪水的破坏性;在报道用词上只选取事件过程关键或重要环节,误导读者对事态发展的全面认知;在抗灾救灾报道中不仅对中国人民英雄事迹描述甚少,还着重笔墨描写事故现场的惨状,以片面化的解读对读者进行价值误导,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①

(三) 话语传播圈层化,挑战主流话语整合

圈子的产生、存在和发展有其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②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和推广,“圈层化”日益成为网络社群发展的新特征,成为由于信息获取定制化、个人社交圈子化、交互关系层级化而形成的一种只在自己的特定圈层中进行信息交互的现象和趋势。^③ 在“圈层化”这一网络聚合体中,个人认知在“信息茧房”的推动下不断窄化,进一步加速了群体间价值分化,最终引起群体极化现象,成为影响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巨大隐患。

在“信息茧房”中受众由于算法推荐技术的快速过滤、精准推送优势,逐渐沉浸在单一的文化环境中,丧失了接触新观点新事物的眼界和动力。对于初次推送不成功的受众,算法可以根据“浏览量”、“点击量”等关键信息进行内容过滤,及时调整推荐内容以满足不同受众的兴趣需求。“信息茧房”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受众认知窄化,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影响力,具体表现在:其一,“信息茧房”导致圈层结构固化。“茧房”内的信息都是为本圈层服务的,圈层内的话语体系紧密贴合受众的个人兴趣需要,这也就迫使主流话语进入圈层取决于受众对主流话语的兴趣程度。长此以往,伴随受众信息推算的精准化,主流话语与圈层之间如同建立起一道厚厚的屏障,窄化了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内容的辐射性和针对性,使主流话语陷入“想进进不去”的困难境地。其二,主流话语形式单一,难以适应不同圈层。圈层受众本着对于个性的彰显,构建只属于“圈内人”的话语体系,再加上主流话语所表现出的内容的严肃性和形式的单一化与圈层受众偏好契合度不高,使主流话语被排除在“圈外”,形成“隔圈如隔山”的状态。如某一“跨国追星圈”把不谈政治定为圈内公认的准则,更加深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与圈层之间的隔膜。

由“信息茧房”最终引起的群体极化现象,是公众话语充分释放的集中表达,其出现的首要原因是具有高度敏感性的社会信息源。在万物互联时代,公众往往凭借一条微博或微信内容就可以进入到公开传播领域,在某一社会热点事件中发表自我观点,通过大数据计算和筛选,具有相同立场的公众就会主动聚集,在意见领袖的煽动下形成群体共识。公众在此基础上通过彼此认同逐渐强化共识,进而形成更加偏激和极端的意见结论。同时,在容易造成群体极化的因素中,现实社会压力和网络舆论压力对个人造成的“羊群心理”发挥了主要作用。当受众在无意识状态下接触到某一热点事件时,即使最初保持中立的态度,在算法推荐作用下高频率的同质化信息也会对受众造成潜移默化的心理暗示和信息压迫,“面对从众压力时,团体成员逐渐怀疑他们的保守,并使自己远离逆耳之言的鼓噪”^④。当受众身处“圈层舆论”的大环境中,为了避免被孤立,即使与舆论导向不一致时也会保留自身意见、调整认知,从而融入圈层群体,这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群体极化现象的发展。当一些谩骂攻击和极端言论在网络圈层中出现并引发现实抵制行为时,现实环境就会遭遇重创,在这种情况下,主流话语往往被极端化的声音所掩盖,加剧社会对立与冲突,影响社会信息传递和共识形成,增加主流话语整合难度。

(四) 资本介入“泛娱乐化”,歪曲主流话语价值

① 靳苏荣、彭亦璇:《中西媒体应急报道文本对比分析》,《语言与文化研究》2023 年第 8 期,第 30-33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135 页。

③ 陈志勇:《“圈层化”困境: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挑战》,《思想教育研究》2016 年第 5 期,第 70 页。

④ [美]艾略特·阿伦森、乔舒亚·阿伦森:《社会性动物》第 12 版,邢占军、黄立清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 19 页。

早在1985年,尼尔·波兹曼就指出:“一切公众话语都以日渐娱乐的方式出现,……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①现代网络媒介的普及成为了“泛娱乐化”现象的加速器,原本不具有娱乐性质的事件和话语被强行用娱乐化的方式表达出来,以满足数字时代受众追求一时快感的感官体验。“娱乐”作为一种使人心身愉悦,缓解生存压力的状态本没有不妥,但一旦受到网络资本的支配,娱乐消遣功能就会被不断放大,从而形成“异化”的“泛娱乐化”。“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②在资本增殖的本性下,资本为了最大限度地刺激消费,对大众文化进行商业化包装,使得一些“泛娱乐化”产品被加工材料过度渲染,歪曲篡改历史真相、丑化历史人物、混淆大众认知,仅仅只为受众带来戏谑、低俗、肤浅的“泛娱乐化”内容。这些喧嚣的“泛娱乐化”产品脱离文化根基,严重偏离主流意识形态正轨,它对于主流话语的肆意解构,对于宏大叙事的严重歪曲,使长期处于缺乏自主思考能力的受众难以辨别真伪,从而形成与主流价值背道而驰的价值观念。

由“泛娱乐化”所构成的错误思潮在不同“主义”之间的胜负之争中逐渐演变为西方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养料”。西方敌对势力借助这些错误思潮,实现意识形态渗透,争夺文化霸权,企图消解甚至颠覆原有的话语体系,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造成巨大冲击。历史虚无主义在意识形态斗争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一方面,一些所谓的“意见领袖”打着“反思历史,还原真相”的旗号片面夸大、肆意解读英雄人物,反对关于英雄人物的宏大叙事。如微博“作业本”帐号恶意营销侮辱邱少云烈士,秦火火为了赚稿费恶意攻击雷锋,这些言论内容上以想象情境代替历史真相,话语表达上以调侃戏谑取代严肃氛围,表面上看是“趣味解读历史”,实际上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话语渗透,具有极强的政治反动属性。另一方面,网络上一些所谓流行热词带有强烈的自嘲色彩,将人的价值衡量指标物质化,同样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典型特征。比如“屌丝”、“打工人”、“小镇做题家”等,将原本正向积极的价值取向和进取心态歪曲为在社会阶层中存在巨大落差的卑微形象,不断激化社会矛盾,同时也合力助长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不良价值风气形成,削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青少年心中的话语影响力。

三、数字技术赋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多维路径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深入挖掘数字技术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正向赋能,防范风险挑战,坚持多维联动、多措并举,在内容供给、主体能力、传播格局、风险防控四个维度上协同发力,全面推进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智能化建构。

(一) 弘扬主旋律,优化主流意识形态内容供给

“做好网上舆论工作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创新改进网上宣传,运用网络传播规律,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③持续优化主流意识形态内容供给,牢牢把握“变”与“不变”基本原则,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是赋能数字时代主流话语的重中之重。

1. 牢牢把握主流话语内容供给的“不变”。首先,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网络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作为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构建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根本任务依然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牢固树立人民群众的共同思想基础。在数字技术发展壮大时代,要提高马克思主义对网络舆论的引导力,同时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不断抢占数字时代价值体系制高点,引领全媒体时代的舆论场,激发网上正能量。其次,要保持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内容的人民性。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指出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

①[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3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9页。

③习近平:《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2月28日,第1版。

同的利益”^①，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因此，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始终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同其他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根本区别。无论是网络空间还是现实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达到聚民心、达民意的效果，使话语权牢牢掌握在党和人民手中。

2. 在“不变”的基础上主动求“变”。不断推进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内容与数字技术的有机融合，确保主流话语不失踪、不失声、不失效。首先，要提高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亲和力。网络主流话语能够传得广、传得远，不仅需要理论自身具有彻底性和科学性，而且需要理论有生动活泼的话语表达，使网络受众在瞬息万变的信息大潮中领悟主流话语的感染力和号召力。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不是将政治纲领背诵给老百姓听，……要联系士兵和老百姓的生活”^②。这就需要优化话语传播，使网络主流话语通过微信、微博、抖音、快手、哔哩哔哩等关注度高的媒体平台，逐步走进大众日常生活，融入受众碎片化时间。同时要创新话语表达，善于运用通俗、生动的表达方式描述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课题，让大众听得懂、愿意听，逐步拉近主流话语和受众距离。其次，要增强话语内容的可视化和互动化。网络的交互性打破了单一传播格局，使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传播者要打破单向灌输的思维定式，增强与大众对话交流的能力。这就需要充分利用短视频方便快捷、感官立体的特征打造主流话语产品，使中国故事更加精彩，中国声音更加响亮。同时要借助数字技术打造多媒体互动平台，让受众在感悟政治理念、领略历史故事、认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过程中加强情感表达、诉说个人体验，弘扬积极向上向善的良好氛围。如“学习强国”应用的“发表观点”功能，使用户在学习相关政治理论后能够结合自身感受表达评论，进一步深化了受众对主流话语的领悟力。

（二）坚持主阵地，增强主流意识形态主体能力

“努力打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求实创新、能打胜仗的宣传思想工作队伍。”^③ 数字时代，面对意识形态工作出现的新困难新挑战，更应该坚持主阵地，提高主流话语主体能力。

1. 意识形态工作者要提高智能素养，坚守网络阵地。首先，广大党员干部仍需筑牢政治理想、政治信念，始终坚定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处理好网络空间的舆论导向。其次，意识形态工作者要不断适应数字技术所带来的日新月异的变化，与时俱进，满足受众新需求。要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者的相关技术技能培训，不断普及人工智能领域相关知识，引导党员干部实现主流话语与网络技术的有机融合，同时鼓励意识形态工作者积极投入人工智能相关技术的研发团队，与研发人员共同探索数字技术与主流话语的融合方式，为产品研发源源不断注入社会主流价值观指引。最后，要培育具有强大号召力和引领力的主流意见领袖。主流意见领袖作为舆论导向的“风向标”，应当及时掌握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的信息动态和活动轨迹，同一切否定、损害、歪曲主流话语的言行作斗争，为主流意识形态营造风清气正的传播环境。当前，网络空间存在的“空场”是导致人们思想与主流话语相悖甚至出现极化现象的重要原因。要充分发挥主流意见领袖的引领作用，对具有恶意、极端倾向的网络舆论做出实时发声、纠正和指导，及时通过主流媒体平台抢占话语先机，还原事件真相，筑牢主流话语传播屏障。

2. 要提高科技工作者的政治素养。虽然技术本身是中立的，但技术在被研发者研发的那一刻就具备了价值导向。因此，要加强对数字技术研发人员的宣传教育，以科学理论引领，用科学理论武装，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科技工作者内心，融入生活方方面面，自觉转化为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通过引导科技工作者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增加他们的意识形态敏锐性，从而更好地将主流意识形态融入到数字技术各领域和全过程，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发挥“源头把关”的作用，推动传播不断走深、走实。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13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81页。

③《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315页。

（三）优化主渠道，提高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效能

提高主流话语在数字时代的引领力，就要重视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加快推进数字技术传播体系建设，守牢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主导权。

1. 加强全媒体体系建设。首先，要建立主流话语智能数据库。人工智能的核心是算法推荐，算法推荐则是基于互联网大数据运行的。因此，要运用算法推荐对数据库收集、分析、应用等手段，善于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想信念教育等话语资源汇聚，构筑主流话语体系的庞大数据库。其次，要构建媒体集群和传播矩阵。传统主流媒体在传播过程中发挥着权威性、公信力的作用，而依托人工智能、算法等现代技术崛起的新兴媒体则兼具新颖性、独特性的技术优势。因此，要善于把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主流媒体与其他各类媒体相结合，形成资源、技术、数据、平台共享的媒体融合发展新格局，推动媒体融合向多维领域拓展。最后，要形成多渠道传播格局。要加强主流媒体在多个传播平台同步话语内容，构建多个主流媒体传播账号，扩大受众范围。同时要加强对当前主流媒体账号细化，形成文字、短视频、直播等不同类型主流媒体传播渠道，实现传播领域全面覆盖。

2. 设置全媒体反向推送机制。主流媒体要善于反向利用“用户画像”，向受众提供正能量话语体系，避免他们沉浸于单一模式而屏蔽主流话语。要构建能够自动识别负能量信息的反向推荐系统，使受众在任何一种兴趣偏好下都能接触了解主流话语体系。反向推送机制通过对用户数据分析进行信息识别，将具有负能量的色情、暴力等反向信息识别出来，从而完成第一步程序。在第二步程序中对浏览信息正常的受众进行正常推送，而被筛选出的用户则会自动进行反向推送，传递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打破用户的负能量“茧房”。反向推送机制运行过程中要实现人机合一，既需要运用算法实现信息甄别分类和推送，同时还需要科技工作者发挥好“把关人”的角色，提高自身的政治素养、拓展知识视野，对反向推送系统错误识别或识别不出的信息内容进行及时调整和更正。

（四）织密保护网，加强主流意识形态风险防控

数字时代意识形态传播渠道的多样化使话语内容隐匿在各种视觉表达中，要确立并完善网络意识形态内容生产的审核与监管机制，完善相关风险处置机制，加强法律体系建设，构筑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最后一道防线”。

1. 要加强对数字内容生产的监察力度，尤其是做好对短视频、网络直播、虚拟现实等传播媒介所生产内容的审核、纠正与监管。首先，要健全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预警机制。网络意识形态传播的隐匿性和开放性决定了要完善相关组织架构，从源头做好网络舆情的跟踪分析。政府可以通过吸纳大量专业人员成立专门的网络舆情预警监测部门，同政治素质过硬、专业能力强的技术人员协同监管网络信息。另外，要善于培养相关专业技术技能人才，引导专业人员重视对大数据技术挖掘、积极探索对图像识别和语义表达方面的研发，通过二者的协同发力实现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及时发现、及时预防、及时处理，为主流话语营造风清气正的传播空间。其次，要完善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处置机制。要实时掌握网络舆论发展动态，针对风险暴露区的网络舆情进行等级评估，重点关注网络点赞、评论、转发数量多的高风险信息，及时介入并做积极引导。同时，要坚持底线思维，警惕还处于低风险区的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舆情影响，运用主流媒体平台及时发声，还原事实真相，遏制低风险舆情向高风险领域转化。要加大对主流话语阵地财力、物力、人力支持，增强主流话语黏性，以“红色文化”保证主流话语阵地永不褪色，把话语权牢牢掌握在党和国家手中。

2. 要健全网络意识形态传播法治体系。首先，要完善网络意识形态相关领域法律法规。“要抓紧制定立法规划，完善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等法律法规，依法治理网络空间。”^①目前，我国已经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等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但面对日新月异的数字技术，仍然要推动社会治理向网络空间全面覆盖，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198-199页。

加快构建依法管网、依法办网、依法上网的网络法治化格局。其次,要坚决依法惩处网络不良言论。当前,互联网仍存在一些故意歪曲主流话语、抹黑党和国家的形象、制造低俗淫秽色情内容的不当言论和违法行为,因此,要依法加强对恶性事件的责任追究,打击虚假宣传,遏制网络暴力,提升大众的网络法律意识,为主流话语传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网络已成为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能否在日新月异的数字时代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话语权,关乎党的领导,关乎国家政治安全。在充分考量网络主流话语发展机遇和现实挑战的基础上,要坚持主流话语方向,不断优化内容供给,增强主体能力,提高传播效能,加强风险防控,维护国家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确保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始终掌握在我们党自己的手中。

Digital Technology Enables the Construction of Mainstream Ideological Discourse Power: Challenge and Response

LIU Zi-ping, MAN Xing-ran

(School of Marxism, Liaocheng University, Liaocheng 252059, China)

Abstract: The accelerated arrival of the digital era, characterized by digitalization and intelligence, has promoted the embedding and integr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mainstream ideological discourse. Under the power of digital technology, mainstream discourse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lexible communication mode, three-dimensional presentation mode and accurate content delivery, which improves the timeliness of discourse transmiss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PC, enriches the concrete expression of discourse, and meets the different needs of the audience. At the same time, the diversification of discourse subjects, the fragmentation of expression modes, the circle of discourse communication, and the “pan-entertainment” of capital intervention bring challenge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mainstream ideological discourse power.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optimize the supply of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content, enhance the ability of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subject, improve the communication efficiency of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and strengthen the multi-dimensional path of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to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promotion, so as to ensure that digital technology can positively empowe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Key words: digital technology; mainstream ideology; discourse power; challenge; response

[责任编辑 常伟]